



沈清松

汉 学 名 家 书 系

自选集

山东教育出版社

「外推」是解决人类困境与哲学问题的灵丹，
 是一不断自我走出，走向他人，走向社会，
 走向其他学科，其他文化，走向自然，
 走向理想与神圣的动力，其中蕴含着愿意自我
 走出的原初慷慨，并借此在相互丰富中完成自我。

主 编 汤一介
副 主 编 金宏达 邹健
执行编委 刘文远

汉 学 名 家 书 系

沈 清 松
自 选 集

山东教育出版社

汉学名家书系

主 编 汤一介

副 主 编 金宏达

执行编委 刘文远

沈清松自选集

沈清松 著

出 版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2092663 传真：(0531)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规 格：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17.125 印张

插 页：5 插页

字 数：385 千字

书 号：ISBN 7-5328-4255-X

定 价：24.8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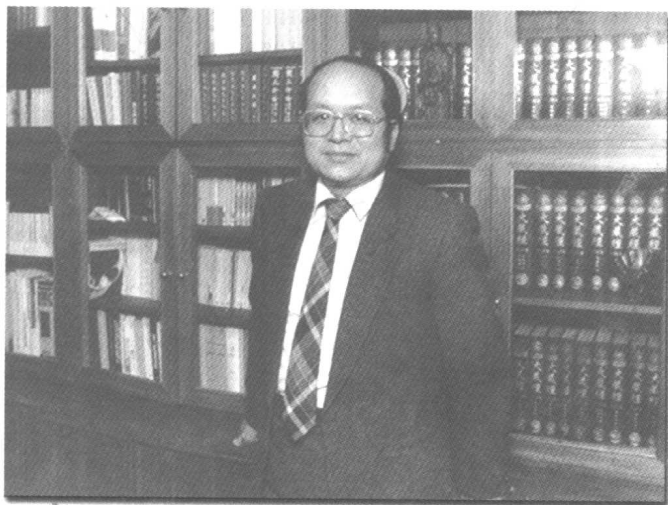
沈清松自选集/沈清松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汉学名家书系/汤一介主编)

ISBN 7-5328-4255-X

I. 沈... II. 沈... III. 汉学-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5981 号



作者像

总 序

汤一介

在鲁迅《拿来主义》一文最后有这样一段：“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①从鲁迅《拿来主义》的全文看，他主张“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现在我们仍然要自己来拿，把西方的和其他民族的好的文化资源按照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统统拿进来，作为养料，建设我们的现代新文化。在鲁迅的这篇短文中也谈到了“送去”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送去”，常常是把一些“古董”和自然资源等等作为“礼物”送了出去，“发扬国光”，无非是向别国“磕头贺喜”罢了，这和真正的文化交流无关。

^① 《且介亭杂文》，见《鲁迅全集》，第6卷，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今天，我们还要提倡鲁迅的“拿来主义”。只有善于并勇于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优秀文化充分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不是以狭隘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拿进来，才可以促使我们自身文化得到更新。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作为“他者”来观照我们自己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看见自身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关于应该引进与如何引进外来文化的问题，最近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不必多谈了，这里我打算多谈一点“送去主义”的问题。

2 我多次访问过欧美的许多大学，感到很吃惊：为什么除了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生之外，学其他学科的大学生几乎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可是，如果看看中国的大学生，哪怕是学习理工医农的同学，他们对西方文化（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等）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有些同学还可以说西方文化的知识相当丰富。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无非是认为我们中国在各方面都落后，那些西方国家看不起我们（包括我们的文化），你们中国有什么可学的呢？但我想，问题也许并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先谈一点历史现象，也许对这个问题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它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呢？查看慧皎《高僧传》就可以知道，首先是由西域或印度僧人把佛教传入中国，然后才有中国的僧人或信士到“西天”去取经。可是中国文化（如儒家、道家思想等等）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相应地传到印度。据《旧唐书》《新

唐书》《宋高僧传·玄奘传》等记载,《道德经》曾译成梵文,但据季羨林先生说,《道德经》“是否传至印度,则我们毫无根据来肯定或否定”^①。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道德经》的梵文本并没有对印度文化发生任何影响,并且早已不存在了。在汉唐时期(甚至到以后各朝各代),为什么印度佛教经典被大量译成汉文^②,而中国的经典和著述却没有被译成梵文(或印度的其他文字)在印度流传,并对印度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呢?

从历史上看,自2世纪起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络绎不绝,几乎年年都有,而且许多僧人往往是一生都在中国度过。到三国以后,才有中国僧人或信士到西域或印度去学佛取经,例如,最早的有朱士行,后来最知名的有法显、玄奘、义净等等,但我们到西天学佛取经的人却大大少于西域和印度来华的和尚,而且中国人去印度的目的很单一和明确,就是去取佛经,几乎都没有把中国文化传入印度的意图。这是什么原因?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给它一种解释。就中国方面说,我认为或许当时由于中国没有一种宗教,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一种维系社会的宗教总是有缺陷的,所以佛教很快就在中国流行起来,不仅影响着众多的士大夫,而且广大中国老百姓也需要着一种宗教信仰。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国的道教是在佛教传入后

^① 《佛教的倒流》,见《季羨林文集》,第一卷,412~42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又见《学海泛槎——季羨林自述》,254~255页。

^② 据唐《开元录》记载,自汉至西晋的250年间,翻译佛经共1420卷,而东晋这一时期(包括同期北方的后秦、西秦、前凉、北凉),则共译佛经1716卷,至唐《开元录》入藏已达到5040余卷。

才正式建立这点看出来。就印度方面说，我认为宗教总是有排他性的，而佛教已经在印度广泛流行，其他思想也就很难进入了。可是这个解释并非完满，为什么我们也没有自觉地主动地把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化的佛教向东邻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传播呢？因此，似乎还得找更深刻的原因。

我们知道，到隋唐以后，我国的东邻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高丽和日本都派遣“学问僧”或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佛教或者儒、道思想，甚至学习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音乐、舞蹈、建筑、饮食等等）。从当时朝鲜和日本僧人带回国的汉文书目可以看出，其中儒、释、道、文、史、笔记、小说种种都有，现在保存在朝鲜和日本的许多汉文典籍在中国却早已散失了，而在朝鲜和日本却被保存下来。可是同一时期或稍后，我们并没有以同样的热情把朝鲜和日本文化也引进中国。这又是为什么？

但很奇怪中国的有些技术却很快传到国外，并为他们所利用，例如“四大发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就是典型的例子。无疑西方技术的某些方面曾受惠于中国，而近两三百年来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中国又远远地被西方抛在后面了，这种现象大概也要求我们作点认真研究。

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基督教）在唐朝已传入中国，但并没有起什么大作用。直到16世纪下半叶后，西方为了开拓市场来到中国，最初进到中国的是一批传教士，如罗明坚、利玛窦等。他们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传教，但也带入了西方的科技和文化，从此西方文化就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虽然后因“礼

仪之争”，西方文化的输入有所中断，到19世纪中叶后，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和入侵，西方文化以更大的规模进入了中国。然而，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并在那里的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例如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推崇备至^①，伏尔泰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②等等。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几乎都不是由中国人所传授的，而大都是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中得到的。从19世纪末到如今，在中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许多方面都是从西方搬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创建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中国新文化。同时，自本世纪初起公私留学生大量流入西方，近年来犹如潮水一般向西方涌入。20世纪前半个世纪，西方列强还在我国办了许多教会学校，输入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价值观念。这一阶段，都是我们向西方学习，主动地或被动地接受西方文明，而我们很少主动地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这又是什么原因？对这一情况，我们也可以给予某种解释。就中国文化自身说，正是由于我们缺乏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而这两种精神又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因而我们需要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对西方文化有

① 莱布尼兹说：“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类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见庞景仁译《莱布尼兹致闵明我的两封信》，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3），1982（1、2）。利奇温说，启蒙运动中“第一个认识中国文化对西方发展之巨大精神作用的是莱布尼兹”。见王昭仁、曹其宁译《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243页，商务印书馆，1990。

② 《伏尔泰书信集》中有一位年轻人理查德（Richard）给伏尔泰的信中说：“您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转引自孟华著《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3。

所帮助的东西吗？难道就没有能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的东西吗？因此，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能就停止于此。

从以上情况看，我们的国家无论在强盛时期（如汉唐），还是在衰弱时期（如清末），在与外国的文化交往中基本上都是“拿来”，而很少把我国的文化主动地“送去”。到现在为止，在西方，除了少数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有点兴趣，在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作了点认真研究而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外（其中还有不少学者是为了西方侵略或掠夺中国文化资源而来研究中国文化的），绝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某些可以对当今人类社会合理发展有意义的资源则盲无所知，他们所知道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只是舞龙灯、踩高跷、扭秧歌、气功或者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

大概在进入 21 世纪的第一周，我企图对上述现象的形成找出原因来，可怎么也难找到一种或几种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合理的说明。但是总不能就这样放下，等别的学者来解释吧！这里我就试着说说我对中国文化出现的这种现象的见解。我认为，在中国强盛时期，我们没有主动地向印度输出中国文化，也许是当时有些中国的士大夫囿于“华夷之辨”，认为外国人和中国人本性不同，外国人很难接受中国的“教化”，如何承天所说“中国之人，稟气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戒之科”^①。可是同时期在中国又有《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为了争胜而炮制了老子出关去“教化”胡人（外国人）的故事，这岂不矛

^① 何承天：《答宗居士书——释均善难》，见《弘明集》，卷三。

盾？特别是在当时（南北朝）和以后（隋唐）有更多的学者和中国僧人认为，印度佛教比中国文化更高明，张镜有“放华犹昏，文宣未旭”^①之语，宋文帝有“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政；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②之论。是时，中国之名门士族之子弟或出家为僧，或在家信佛^③。而广大老百姓崇信佛者如狂潮，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宋朝以后，理学兴起，明里批判佛教，而暗中又吸取佛理，而把佛教思想融化于儒学之中。这一时期，尽管中国人在佛教问题上有种种不同之表现，但总体上说在接受外来文化上表现着一种开放的“自信”态度。当中国文化处于衰弱的情况下，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虽有种种不同，但从总体上说仍然是积极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甚至可以说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全盘西化”的情形。这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丧失了对自身文化价值的信心。^④对中国文化这种非常复杂的状况，要想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无疑是相当困难的。在这里我只是尝试着给它一种解释，请大家来共同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

① 张新安（张镜位至新安太守）：《答譙上论孔释书》，见《弘明集》，卷一。

② 《高僧传·慧严传》中引宋文帝语。详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与第十四两章。

③ 如道安“家世英儒”（《高僧传》卷五），道生“家世仕族”（《高僧传》卷七），僧慧“高士謚之苗裔”（《高僧传》卷八）等等。至如士人之崇信佛法者，南北朝有谢灵运、刘勰、郗超等，唐有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不胜枚举。

④ 进入20世纪，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中西古今”之争，在对待中国文化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激进的、保守的和改良的，而激进引进西化派则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参见拙著《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上有较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在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上则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如果进一步分析，也许这种状况和我们的民族性格有若干关系。在历史上，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比较宽容，也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比较强；但中国人却比较缺乏向外的进取精神，或者说中国文化在进取性上比较弱。换一个说法，也许可以说在我们强盛时存在着一种“天朝大国”心理，认为其他民族或国家到我们这里来学是天经地义的，或者认为外来文化到中国来总会被中国文化所包容。在我们的国力衰落之初，仍然存在着这种盲目的自大心理，但随之而来的是在处处挨打的状态下又变为“自卑”，觉得处处不如人。无论“自大”或“自卑”都说明我们在文化上是缺乏进取精神和自知之明的。如果再进一步考察，这也许和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有关。自古以来我们的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农业宗法专制社会，这种社会是缺乏开拓性的，比较多地注重守成，因此不大注意向外输出自己的文化，在制度和观念上都压制着开拓精神。例如，把发配到边远地区作为惩罚，把“父母在不远游”作为伦理准则等等，都阻碍了我们主动地向外传播文化。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向外推行文化扩张的意思，而是认为文化上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才比较正常，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双向交流才可以使交流的双方都受益。

时代已进入 21 世纪，我们的社会必须加速向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化，因此在文化问题上也应有态度上的转变。中国人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应更加注重“选择性”。鲁迅说，对外

国“送来”的东西，“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要“挑选”。我这里说的“要更多注重选择性”，不是要排斥什么，而是应从更大的范围里挑选西方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中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在我们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 and 民族时应更加有“自觉性”和“进取”精神。我这里说的“进取精神”不是说要把中国文化强加给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样做不仅是不可取的，从根本上说也是不可能的），而是要让别国人民更多地了解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因此，在我们和国外的文化交流上应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积极吸取国外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主动地向外国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在文化的对话和讨论中共同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

当前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并不会消除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因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加剧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冲突。因此，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的讨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共处”，还是因文化的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将影响着 21 世纪人类的命运。就目前情况看，全世界在文化问题上存在着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文化上的部落主义。某些西方国家为维护他们的霸权地位，仍然在鼓吹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而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国家为了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而陷入文化上的部落主义。今天在我国文化界或多或少也受着上述两种思潮的影响。有少数学者主张要把西方文化不加选择地全盘“拿来”，而对中国自身的传统文

化采取否定的态度；又有少数学者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走入死胡同，21世纪东方文化（或中华文化）将会主导人类文化的发展。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不能说是客观地、理性地认识世界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势，都是不可取的错误态度。当前，人们应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考察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多元开放的新格局。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普及，把世界联成了一片，因而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与交流，将是不可避免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将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只能在商谈和对话中，在互相参照、取长补短中得到发展。同时，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相继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随之逐渐衰退，各民族、各国家要求发展自身文化的内在价值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强迫其他民族和国家全盘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的企图越来越难以得逞了。因此，当今人类文化从总体上说只能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今后中华文化既要提倡“拿来主义”，又要提倡“送去主义”，以便我们能在与世界其他各种文化的双向互动中得到更加合理的、健康的发展。

说到“送去主义”，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中华文化有什么东西可以而且应该被送出去呢？”“如果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什么对当今人类社会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提出‘送去主义’岂不是一句空话吗？”我想对这样的问题作点尝试性的回答。在我这篇文章中当然没有可能全面论述中华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可以作出贡献的方方面面，这是我的能力全然做不到的。现

在只想以我认为儒、道两家中某些仍然有益于人类的思想为例，来回答我们在提倡“拿来主义”的同时，也是应该可以提倡“送去主义”的时候了。

我们编辑这套《汉学名家书系》就是想在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上起一点作用，一方面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优秀文化引进我国，另一方面又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其他民族和国家，使不同文化在双向交流中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在相互交流中增进了解和友谊，促进当前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在这套丛书中，我们选择了九位在海内外有相当影响的华人学者，各自编选一本《自选集》。正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而又长期在海外及台湾地区从事学术文化研究，因此是一批中西兼通的学者，这样他们就可以起着向内地学者介绍他们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海外学术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作用，并可以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努力向外国介绍中国古今学术文化的价值所在。这也就是说，既可以通过他们“拿来”海外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又可以“送去”中国学术文化的真精神。这些华人学者可以说是同时在完成着学术文化上“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双重的任务。也许我们可以说，他们无疑是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和促进世界国家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使者。

自 序

近代世界形成以降，世局的发展是由西方文明所主导。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之后，崇尚人的主体性；16 世纪的科学运动，更带动了人类征服自然、宰制人群。工业革命使人类能运用技术征服自然，并肇始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启蒙运动更以科技进步作为人类进步的衡量。西方的科技表现为船坚炮利，打出中国自 19 世纪以来所承受的苦难，至今未息。然而，西方近代文明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社会与文化已然陷入危机。西方近代以“主体的自主”“二元的对立”与“分割而宰制”为主调的文化，迄今已然问题丛生，甚至日趋没落，世人对此早已有所警觉，势必要改弦更张。就此而言，“慷慨的外推”“多元的对比”与“充量的和谐”势将成为 21 世纪甚或今后数世纪的指导精神。